

继承与创新

王维贤
倪宝元

教授教学科研50周年纪念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继承与创新: 王维贤、倪宝元教授教学科研 50 年纪念文集/邵敬敏主编.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4
ISBN 7-5338-2356-7

I. 继... II. 邵... III. ①王维贤-学术思想-纪念文集②倪宝元-学术思想-纪念文集③语言学-文集
IV. HO-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0) 第21641号

继承与创新

——王维贤、倪宝元教授教学科研 50 年纪念文集

主编 邵敬敏 责任编辑 潘晓东

*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杭州出版学校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4 字数 245000

2000 年 4 月第 一 版

200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

ISBN 7-5338-2356-7/H01

定 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王维贤教授
(1922.11-)



倪宝元教授
(1925.1-)

目 录

王维贤教授传略	1
倪宝元教授传略	3
学习与研究——王维贤教授自述	5
倪宝元《成语例示》序（姜亮夫）	18
倪宝元《现代汉语难词词典》序（胡裕树）	21
从名家改笔中学习修辞本领	
倪宝元《汉语修辞新篇章》序 [节录]（秦牧）	25
名家改笔值得学习研究	
倪宝元《汉语修辞新篇章》序 [节录]（周振甫）	28
评王维贤先生的语言学研究（邵敬敏）	29
王维贤先生逻辑思想探析（徐颂列）	39
倪宝元教授修辞学研究的贡献与特色（张宗正）	46
倪宝元教授的成语研究（姚鹏慈）	62
导师给了我锐利工具（潘晓东）	72
照应的结构限制和认知解释（袁毓林）	79
疑问句的类型和语义分析（戴耀晶）	101
程度与情状（王邱丕 施建基）	114
三个平面理论解析（陈月明）	124
从各级语法单位谈汉语的特点（徐静菡）	135

关于词的意义 (曹庆霖)	143
现代汉语“是”字的语义功能及其历史演变 (周晓康)	149
《红楼梦》动词重叠句研究 (章一鸣)	168
《金瓶梅词话》中的把字句 (王明华)	177
论名句的生成 (彭利贞)	192
条件复句的语用功能 (任芝瑛)	207
转折句的逻辑语义关系 (胡培安)	214
新世纪语言文字规范的若干思考 (王建华 袁国霏)	220
语用环境、语体风格和修辞学体系 (王维成)	236
《史记》的修辞艺术与传统等级伦理文化 (池昌海)	250
朱自清散文比喻之分析 (刘雪春)	259
拈连三题 (方林刚)	269
语音修辞与广播电视语言 (吴子慧)	276
汉字使用频度与海外中文教材 (郑良根)	287
附录	
王维贤教授论著目录	298
倪宝元教授论著目录	305
王维贤先生、倪宝元先生历届研究生名录	316
后记	318

王维贤教授传略

王维贤,1922年11月生,北京市昌平县人。1946年毕业于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哲学教学系。1946年暑假考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哲学系和北京私立燕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插班生,肄业一年。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哲学部,读西方哲学史研究生。1948年暑假到浙江大学附属中学任语文教师。1951年暑假,浙大附中与蕙兰中学合并为杭二中,转入杭二中任语文教师,并兼任语文教研组组长,1952年兼副教导主任,1954年兼教导主任。1955年被评为杭州市教育先进工作者。1956年暑假调入浙江师范学院任中文系讲师,并在政治系兼课,教现代汉语和逻辑。50年代末又兼教语言学概论并兼语言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978年暑假恢复职称评定工作,被评为副教授,1986年评为教授。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前后招收了6届,1988年退休,1991年送出最后一个研究生后,离开工作岗位,但至今仍不时为在校现代汉语硕士研究生、汉语史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讲现代语言学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等课程。在教学岗位上,除教过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和逻辑等基础课外,还为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先后讲过汉语语法论文选读、现代汉语语法学史、转换生成语法、普通语言学、现代语言学、现代汉语语法专题讨论、语言的逻辑分析等课程。

在研究方面,除解放前写过3篇哲学论文外,在自己从事的语言学和自然语言逻辑方面,先后出版了13本专著(包括主编的和合著的),发表了70多篇专业性的文章。其中主要的论文有30多篇,大都是有关现代汉语语法的。这些论文大部分收入《现代汉语语法理论》论文集中。这些论文相当一部分发表在1988年以后。

这说明高等学校教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身体允许的条件下,并不受 60 或 65 岁的退休年龄的限制,人文科学尤其是这样。

王维贤曾先后到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师范学院、杭州师范学院讲学,并曾先后在成都、敦煌、昆明等地讲学。这些活动促进了他同同行们的学术交流。

王维贤的著作曾多次受到奖励。《现代汉语的短语结构和句子结构》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83—1984)二等奖,《逻辑学(修订本)》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85—1986)三等奖;《论“转折”》获浙江省高等学校文科科学成果奖(1986)二等奖,《说“省略”》获浙江省高等学校文科科学成果奖(1987)二等奖,《语言逻辑引论》获浙江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89—1990)一等奖,《语言学词典》获浙江省教育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成果(1992—1993)二等奖,《现代汉语复句新解》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93—1994)优秀奖。1993 年王维贤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60 年代,王维贤参与筹建浙江省语言学会。1980 年浙江省语言学会成立,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1988 年后任学会顾问。在王维贤任会长期间,曾创办《中学语文报》,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同年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理事,1987 年选为常务理事。1978 年在全国逻辑讨论会上被选为新成立的中国逻辑学会理事,90 年代后被聘为顾问。在浙江省语言学会成立后不久,王维贤参与筹备并建立了浙江省逻辑学会,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是 1979 年成立的,王维贤被选为第一任理事长。后来担任学会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这个学会曾创办中国逻辑和语言函授大学,他先后任该函授大学的副校长和顾问。王维贤还曾担任浙江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理事、咨询委员;浙江省哲学学会理事和顾问。

倪宝元教授传略

倪宝元,笔名苞园,男,1925年1月7日出生。浙江省永康市人。

1948年夏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曾任中学语文教师、教导主任、浙江省教育工会干部。1956年以后一直在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86年晋升为教授。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中国修辞学会顾问、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顾问、浙江省语言学会顾问、华东修辞学会名誉会长、《修辞学习》杂志主编、顾问(1982—1984年为顾问,1985—1997年任主编,1998年以后又为顾问)。

倪宝元一直喜欢“语文”。在高中读书时曾在《东南日报》上发表过3篇文章,为语文老师谢伟声所“得意”,加入“荒草文学社”。在大学读书期间,学的虽然是历史,但喜欢文艺。曾用笔名“苞园”在《东南日报》、《大同日报》等报上发表散文20余篇。解放初期曾在《文汇报》上发表杂文30余篇。1956年以后,由于教学的需要才专攻语言,特别是现代汉语。

他致力于祖国语言的教学与研究。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调查研究,注意语料的积累,重视能力的培养,提倡求实探新,积极促进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努力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和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倪宝元已有50年教龄。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大批人才。他培养的研究生大多数已获得高级职称,有的还在国外施展才干。由于他对高等教育作出突出贡献,曾受到国务院的表彰,并终身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

他治学严谨,硕果累累。已出版的专著有《成语辨析》、《汉语

修辞新篇章》等 16 部,由他主编的有《大学修辞》、《成语范例大词典》等 8 部,与人合编的有全国高校自学考试统一教材《现代汉语》等 4 部。还发表论文 120 余篇。

他的著作曾获首届陈望道修辞学奖、首届董建华文史哲科研成果奖。首届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获得一等奖;第二届,他又获一等奖。在省里他一连得了 5 个奖。

倪宝元对汉语作多方面的研究,成绩最显著的在修辞和成语两个方面。他的修辞研究和造诣在国内外颇享盛誉;他的成语研究,方面之广,论著之多,都在全国领先。

他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从事他的学术研究。他的“著述养生,奉献为乐”的精神令人钦佩。他退休后仍保持平均一年出一本书的速度,令人惊讶。他退而不休,老有所为,不断对学术事业作出贡献,因此他于 1997 年荣获首届浙江省“老有所为奉献奖”。

倪宝元教学科研的事迹《光明日报》、《浙江日报》都曾作过报道。国内外不少工具书如《中国语言学大词典》、《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词典》、《中国语言学家》、《汉语语法修辞词典》、《现代汉语知识大词典》、《中国当代学者大词典》、《中国高等教育专家名典》、《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中国社会团体会长秘书长辞典》、《科学中国人》、《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华兴国人物品典》、《浙江教育名人》、《杭州大学教授志》、《中国当代创业英才》、《当代育才精英辞典》、《中华英才荟萃》、《二十一世纪人才库》、《中国人才辞典》、《中国教育专家人才名典》、《辉煌成就,世纪曙光》、《中国人才世纪献辞》、《国魂——跨世纪中华兴国精英大典》、《中外名人辞典》、《世界优秀人才大典》、《世界文化名人辞海·华人卷》、《世界优秀华人教育专家名典》、《全球华人专家名人远程交流协作网》、《世界名人录》等都立有“倪宝元”条,收录了他的事迹。

学习与研究

——王维贤自述

在我刚进入虚年龄9岁的1930年春节后不久,我开始入私塾受启蒙教育。我们的启蒙老师朱勋臣先生是清末最后一代的秀才,他从3本小书(《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教起,然后教我们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诗经》和《古文释义》中的部分篇章。1931年暑假,我到北京读小学,接受现代化教育,主要是补习数学。我念的高小是“直均小学”,它的严格的、一丝不苟的教育,给我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基础。

1936年,我考入北京第四中学。1937年暑假,“七七事变”爆发。暑假后开学,我们感到的最大变化是学校里来了一个日本顾问,每星期增加了两节日文课。绝大多数学生对日文采取了抵制态度。在四中读书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语文老师李子诩先生和数学教师马文元先生。李先生是引导我学好语文的好老师。李先生身体不好,听说他曾对他的家属说,他死以后,要把他埋在永定门外,好早一点看到打回北京的中国军队。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育。马文元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数学教育家,他那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大代数”(高中代数)教学,唤起了我对数学的兴趣。

四中严格而不苛求的学习环境,日伪统治下的特殊境遇,使我对哲学和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看柏拉图的对话录,看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看杜威的《哲学的改造》,看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看胡适的《胡适文存》,看顾颉刚的《古史辨》,特别是《古史辨》的洋洋洒洒的长序。当时我还小,不知他们属于哪个流

派,也没有批判辨别的能力。但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做学问”、“思考宇宙人生”的道路。

1942年,我考入了当时北京惟一的私立大学中国大学。当时没有随北大、清华南迁的,以及刚被日本人查封的燕京大学的大部分教授都到中国大学来任教。中国大学是一个在特定条件下保持民族气节的教授们的避风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得以有机会聆听一些饱学的教授的课。例如,我在主修的哲学教育系曾听过严群先生的西方哲学课,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课,周叔迦先生和王森田先生的因明和印度哲学课,邓以蛰先生的美学课,童德禧先生的心理学课,温公颐先生的道德哲学课。其中尤以听严群先生和张岱年先生的课最多,对我的帮助也最大。说也奇怪,当时作为主修课的仅有的一两门教育课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倒是选修的中文系课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在中文系曾先后听了顾随先生、俞平伯先生和孙人和先生的词选,以及孙人和先生的《庄子》。记得第一次听顾先生的课,讲的是温飞卿的《望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一首。他那用充满感情的语言描写情境、塑造意境的讲演,使我终生难忘。孙人和先生教《庄子》时,文章、考据、义理“三结合”的讲课风格,也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我讲这些,是为了说明中国大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怎样为我们这些普通的大学生提供了向这些饱学宿儒学习的机会,也为了说明我那时的一段博采众说、兼收并蓄的学习经历。

大约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上半年,我曾在严群先生主编的《正报》副刊《哲学》上发表过3篇哲学方面的文章。一篇是评论李世繁先生写的《颜李学派》的书评;一篇是介绍一本叫 *The Ways of Kwowing* 的书的;一篇《论道》是讲中国的哲学范畴“道”的,这是一些习作,也是我写的仅有的3篇哲学论文。直到1998年,又重操旧业,为一本叫《怀德海文录》的书翻译了4篇哲学论文。

1946年,在抗战胜利后的第2年暑假,我考入了复员后的清华大学哲学系和复校后的燕京大学哲学系的三年级插班生。因为这两个大学的必修课我都已读过,而且大部分是这两个大学的教师教的,因此可以随意选修一些高年级课程。我在燕京大学选了张东荪先生讲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梅贻宝先生的《墨子》研究;在清华大学选了金岳霖先生讲的休谟《人性论》和逻辑学,选了王宪均先生讲的逻辑实证主义,主要讲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第2年,我考入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跟贺麟先生读西方哲学史,并选听了陈康先生的柏拉图,张颐先生的黑格尔。张先生是研究黑格尔的专家,但是他讲的黑格尔跟黑格尔本人一样难懂。这时我接触的主要是唯心主义哲学家。过去讲西方哲学史的人都把他们看作西方哲学的主流。他们也的确是了解西方思想的钥匙。这段经历,对我了解西方思想是很重要的,而且老师们读书与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也启发了我的思想,并学到了一种有效的学习和教学方法。

在我步入社会的时候,我先想到浙江大学哲学系,后来改到浙大附中任语文教师。在浙大附中和杭州二中先后任教8年中间,我的主要任务是教书和担任一定的教学行政工作。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史哲是不分的。教语文,可以说是改行,也可以说只是扩大了我的活动范围。从对后来的教学和研究讲,这段经历除去积累了较多的教学经验外,最主要的是使我接触了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的、科学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拓宽了我的视野,活跃了我的思路。从接触,到学习,到认识,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使我对过去接触过的那些零碎的中国的,西方的,印度的思想文化,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在学术上的真正的“倾向”,是从1953年试教新编的初中汉语课本开始的。在试教期间,我认识了当时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的任铭善先生和蒋礼鸿先生,还同任铭善先生同时在杭州中

学教师进修学校教过现代汉语的语音和语法,得到进一步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1956年暑假后,我调到杭州大学前身浙江师范学院任教。当时政治系要我教逻辑,中文系要我教现代汉语。最后我选择了中文系,不过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一直既教现代汉语、语言学,又兼教逻辑。1978年,我招了现代汉语研究生,才专教语言学方面的课程。1978年以前,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除了写了3篇有关语言学的论文(《〈马氏文通〉句法理论中的“词”和“次”的学说》、《言语三论》、《也谈词义和概念的关系》)外,只写了一些发表在《语文战线》上的零碎文章。这期间我编写了我教过的几门主要基础课逻辑学、现代汉语(语法部分)、语言学引论的内部发行的教材,还选编了几十万字的《语言学引论》的参考资料。其中除《现代汉语语法》经过删改后出版外,都未正式出版。现在看来,大部分陈旧了。

60年代初,先有朱德熙先生到杭州大学中文系教了半年现代汉语,接着又有方光焘先生,高名凯先生,陈望道先生,以及随同陈望道先生来的胡裕树先生等先后来杭大中文系讲学。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活跃了学术空气,促进了中青年教师的学术研究。这种在国内高等学校间的相互讲学活动为“文化大革命”所打断,是非常可惜的。1978年以后,通过某些学术会议和办讲习班的机会,进行了一定的学术交流,部分地弥补了这一缺陷。吕叔湘先生,周祖谟先生、张斌先生和张志公先生就是借这种机缘来杭州讲学的。

1966年以前我的主要语法观点是吸收结构主义的某些理论和方法的传统语法,主要语法理论背景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期间我同一些青年教师一起或单独地阅读过叶斯泊森的《语法哲学》和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以及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英译本,当然也读了一些传统语法,特别是汉语语法的著作。

在我编写的《语言学引论》所引用的参考资料中选的大部分是苏联学者的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继承人的一些言论。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语言学研究,是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

经过 5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中期的历史的知识分子都清楚,从 1957 年到 1976 年的 20 年间,只有 1961 年到 1963 年是真正能坐下来研究学问的日子。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正面地、侧面地或反面地卷入到“运动”中去,不但谈不到什么研究,甚至专业学习的权利和时间也被剥夺了。我们的“学术生命”被砍去了 20 年。当然,我们的生命并未停止,这 20 年也为我们积累了特殊的生活经历、思维经历和一些富于启发性的研究素材。我们的研究损失了最富创造性的 20 年,我们的生命却没有白白浪费。

1977 年,恢复了大学的正常运作,也恢复了大学教师的教学和科研,使大学教师看到了自己和他所从事的科学事业的美丽的前景。1978 年以后,打破了我们几十年的闭关锁国状态,重新开始了同世界学术文化的接触。那时我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希望补回失去的时间,扩展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大约在 70 年代末,我曾用乔姆斯基的《句法理论的一些问题》作为研究生语法理论的教材,用读书报告加讨论的形式学习和研究转换生成语法的标准理论。不久,我们又学习了格语法与生成语义学,以及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法。我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还在华东师大的一个讲习班上介绍了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一些问题》。当时有一位听课的老先生建议我写成文字发表。后来直到 1985 年,因为有了《语文导报》这个园地,我才以系列文章的形式简单地介绍了索绪尔、布龙菲尔德和乔姆斯基。后来由于该刊停刊和我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其他学派没有介绍下去,直到 90 年代初,才为研究生以《当代语言学》的书名写了一本较详细的讲义,但一直没有出版,甚至连铅印的机会也没有。

另一个影响我学习和研究的因素是自然语言逻辑。1978年5月,由哲学研究所出面在北京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逻辑学讨论会。会上一些给中文系上逻辑课的教师准备合作编一本教材,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逻辑与语言研究会。这个学会后来发展为国内研究语言逻辑的中心,不久又成为研究符号学的主要集体。在这个学会的活动中,经常有逻辑学界对语言逻辑有兴趣的江天骥、周礼全等先生参加,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并结识了后来长期合作研究的李先焜和陈宗明两位先生。我们先后合作编写了《语言逻辑引论》、《中国语用学思想》和《逻辑百科辞典》的语言逻辑部分。另外又曾与有关同志集体翻译了瑞典奥尔伍德等著的《语言学中的逻辑》和麦考莱的《语言逻辑分析》。我的主要研究方面虽然是现代汉语语法,但这方面的研究对我语言学研究起着重要影响,成为我的语言学背景的一部分。

我在60年代初写的3篇语言学论文的基本思想,概括起来有这样3点:一、语言学研究的是运用于现实交际中的言语背后的语言系统。语言是言语中抽象出来的,或者说是本来存在于言语中的交际双方必须遵循的规则系统。语言不同于言语。二、不同语言,由于作为认识和交际工具的共同特点,它们有共同的基础。但是它们各有自己不同的形式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点,模仿和创新是不矛盾的,模仿是起点,创新是归宿。三、词义同概念的关系问题是语言和思维关系的关键。词义虽然不等于概念,但概念必须以词义(广义的词义,即包括词与词组合的复杂的词义)为存在的形式。这是认识论中反映论的基本原则。这些观点虽然是模糊的,不成熟的,但是却影响着我后来的语言学思想。

80年代初,我参加出版了两本讲义。一本是杭州大学等十院校编的《逻辑学》(1986年由我主编修订再版),一本是《现代汉语语法》(与卢曼云合著,由原内部讲义改编而成)。前一本书既可以

看作我教传统逻辑的总结,也可以看作我向传统逻辑教学的告别书。后面那本现代汉语语法讲义,以及随后两年写的《现代汉语语法分析纲要》(只发表了其中总论部分),《北京话儿化韵的音位问题》,基本上是以结构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汉语的。那时结构主义真正成了当时我国语法研究的主导思想。同一个时期发表的《论“转折”》和《复句和关联词语》可以说是我试图用现代逻辑方法研究复句间的逻辑语义关系的一种尝试。而一篇短论《语段和语文教学》可以看作我初次涉及了篇章语言分析问题。

就在这段时间,有一位全国现代汉语语法教材的主编先生约我和我的同事写一本难句分析的小册子。在准备这本书稿过程中,我逐渐感到许多“难句”如果放在一定的语境中,就不再是所谓“难句”,而且它的结构形式是可以由一定的句法结构规律加以解释分析的。它之所以成为难句,是因为把它孤立起来,用传统语法的所谓句法规律(即孤立的、抽象的句子的句法结合规律)加以考察。语法不仅要研究孤立的句子的句法规律,还要研究实际交际中由于语用因素的制约而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句子的句法规律。这种在当时属于“离经叛道”的书稿,理所当然地被主编和责任编辑所拒绝。其中由我写的总论的部分内容,后来以《析句释难》和《析句的目的和方法》的篇目发表。这两篇文章,以及80年代中期发表的《现代汉语的短语结构和句子结构》、《论“省略”》和《现代汉语的句法结构、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等文都可以看作这一思想的发展和逐渐系统化的过程。同一时期发表的《现代汉语动词和形容词的名物化》则是直接用乔姆斯基关于名物化理论对汉语名物化现象的一次解释。

在《现代汉语的短语结构和句子结构》一文中,我先提出“类型和实例”、“深层和表层”、“语法和词汇”、“孤立和语境”等几对范畴,主要是想说明:“类型”是相对的;不能只研究句子的表层;词汇

和语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要注意语境对语法结构的制约。着重讨论了短语和句子的区别以及句子的类型(句型),特别是后面这个问题。当时我分别了句类、句式 and 句型。句类是由“语气”区别出的不同类别的句子,着重在由句调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自然交际中出现的一切“句子”,包括具有一定语调的省略的和非省略的形式,是句式。句型则指所有所谓“足句”,即非语用省略的,不需要上下文补充就可以表示一个完整意思的“句子”的“类型”。并提出“句型”的“层次”的概念。最高的句型是“ $X\ominus X$ ”(主谓句);而“ $X\ominus X\oplus X$ ”(主动宾句),“ $\bigcirc\ominus X$ ”(无主句), X (独词句)等等则是次一级的句型。讨论句型达到什么层次,是由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决定的。在《说“省略”》里,我从表层句法结构同深层语义结构的关系,把“省略”分为“语义省略”“句法省略”和“语用省略”3种,并认为它们应分别从语义学、句法学和语用学3个不同角度加以研究。该文指出,着重从深层语义结构的角度看问题的语言学家认为这三者是同样的在表达上对某些语义成分的省略;而着重从表层结构看问题的语言学家则认为无所谓“省略”问题。实际上研究语法时承认并区分这3种省略是正确分析语法规律的前提。文章的主要倾向是,从表层结构同深层结构的联系中分析句子,才能完整地认识贯串于语言的3个不同平面上的语法规律。在这一阶段,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我的观点的是《现代汉语的句法结构、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一文。在这篇论文里,我改变了过去承认的流行的关于短语是语言单位,句子是言语单位的主张,认为短语和句子(具有句子语调的任何可以在交际中用作句子的结构形式)都可以是言语单位或语言单位,主要看它是否出现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语言形式只有语言意义,言语形式才有同现实联系的内容。我把语言形式分为3个层次:一、由句法规则生成的,以词类范畴及其相互之间的句法关系为形式的“短语结构”;二、在短语结构的相应